

# 世博狂欢后的文化展望

朱大可

世  
博  
狂  
欢  
后  
的  
文  
化  
展  
望

上海世博的狂欢早已结束，但我们仍可以重溯这场狂欢的基本结构，它由三种基本元素构成：①绚丽的火焰（幅员辽阔的照明体系、天空上烟火、火炬）；②狂热的人群（大数量的参观者）；③中国馆的倒金字塔以及稀奇古怪的各国建筑群、内部的展品、超大多维视屏和布展方式等等。所有这些事物组成了史无前例的庆典。原南市发电厂烟囱，世博时被改造为城市未来馆的“温度计”，尽管其本意是要表达都市盛夏的温度，而最终却成为一种狂欢热度的象征。

在狂欢之后，一种“节后综合症”在上海蔓延。市民陷入了极度的空虚之中。一些学生曾经向我抱怨：世博结束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这种病症的深度，跟狂热的热度成正比——节日愈是闹猛，节后的空虚感就越是强烈。而医治“节后综合症”的唯一疗法，就是尽快忘却这场盛典，重返旧日生活的轨道。毫无疑问，上海人和全中国人都走过了这个程序。他们先是狂热，而后是惆怅的空虚，最终则是淡然的忘却，仿佛这座城市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件。遗忘是上海世博的最大遗产。

从一个比较“专业”的角度看，上海世博还有另外三件建筑空间遗产，它们分别是：中国最丑建筑中国馆、南市发电厂的烟囱温度计，以及被大幅度炒热的世博园区地产。

中国馆被改造成上海美术馆，却废弃全球通用的“美

术馆”称谓，而采用一个相当恶俗的政治称谓——“中华艺术宫”，这已成为国内美术界广泛流传的笑话。该馆拥有 27 个展厅，除去贮藏空间、休闲空间、学术空间和教育空间，仅公共展示面积，便多达 6.4 万 m<sup>2</sup>。这是令所有美术馆行政主管都惶惶不安的巨型空间，它因无展品可充填而变得怪异起来。它展示了一种严重的空间失调——建筑的宏大叙事，跟展品的高度贫乏，形成具有讽刺意味的对比。但这并非是宫主的责任，而是整体文化原创力衰退的必然后果。

由未来馆改造而来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总建筑面积为 4.1 万 m<sup>2</sup>，具有 12 个展厅以及图书馆、研究室、报告厅等功能性设施等。该馆声称争取三年内完成作品入藏 3000 件。这个数字，跟 600 多万件藏品的伦敦大英博物馆、400 万件的卢浮宫美术馆、200 多万件的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即便以平均每年增加 1000 件的高速度推进，要想填补这个巨大的鸿沟，仍需耗费 2000~6000 年的时间。而在两千年之后，这些浮夸的建筑早已化为尘土。

两个“后世博”艺术展馆空间，空空如也，大而无当，找不到具有展示价值的实物加以充填，由此构成一个罕见的建筑式象征，喻示着文化衰败的严酷现状。历经 20 世纪的多次政治和战争浩劫，中国传统文化器物（书画和雕塑）已所剩无几，而当代艺术虽有资本市场的推动，却无法形成自由创造和文化繁荣的盛大景观。体量过于庞大的美术馆建筑空间，只能剧烈地反衬这种文化的空无。任何“大繁荣”和“大发展”的动人口号，都无法遮蔽这个尖锐的事实。

那么，人们热衷于谈论的所谓“后世博效应”，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世博局官员及其工作人员，手头拥有一大堆世界顶级设计师、策展人和演出团体的名片，可以用来进行各种文化输入活动；与此同时，世博园地

作者：朱大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块被炒成了天价，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巨大的 GDP 资源。但除此之外，上海世博还有什么更深刻美妙的文化遗产呢？

我们已经看到，世博期间发生的大量不文明现象，并未成为一种刻骨铭心的全民教训，而世博中国馆所陈列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未能成为居民素质自我改造的历史参照系。上海世博，没有为中国人的个人教养，提供一个上升的支点，恰恰相反，在近期发生的各地反日示威中，“打砸抢”之类的“文革”场面，竟然堂而皇之地卷土重来，令人们对“后世博时代”教养改良的期待，最终化为一个绚丽的泡影。

不仅如此，世博中展出的西方文化和创意作品，并未成为都市居民参与文化科技的动力。仅以上海为例，我们没有看到这座城市出现创意、创新和创造浪潮的任何迹象，世博精神、世博科技和世博文化，从未真正进入社区，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世博也没有推动全国的都市艺术化改造，成为公共空间、公共雕塑和公共壁画的进化动

力。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也没有显著的进化迹象；尽管地铁的长度在不断增加，而上海交通的堵塞状况，反而有恶化的趋势，鉴于私人轿车的大量增加，居民停车难的问题愈演愈烈，正在成为上海及各都市的最大空间危机。

世博的中文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英文的汉语直译应为“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可视为当局向民众做出的一种重要承诺。但上海世博（2010年5月1日~10月31日）后的整整两年以来，在全国城市化的浪潮中，各地到处在发生强拆悲剧。某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勾结，以暴力手段，强行摧毁公民住宅，导致大量流血和死亡悲剧；最近四川成都、江苏启东、宁波镇海因企业污染引发的居民抗议，也已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这是否意味着，城市改造和工业化的每一寸空间进程，都必须以伤害公民个人权利为沉重代价？无论如何，这些激烈的冲突事件，业已瓦解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诺言。关于世博遗产的谈论，只能终结于一个黑色的句号。

# 得与失：作为社会空间再生产动因的城市重大活动

杨贵庆

得与失：作为社会空间再生产动因的城市重大活动

“城市重大活动”一般是指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带来重要影响的公共事件。在更多的语境下，这类重大活动一般是由政府组织、自上而下推动的，而且希望通过重大活动给城市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和推进。例如，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上海 2010 年世博会、西安 2011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等。国内如此，国际上也不例外。例如伦敦举办的 2012 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给伦敦城市东部地区的重建复兴带来了重大契机。总体来看，城市重大活动本身的国际化特征以及给城市所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甚至对一个国家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积极营销所带来的促进，使得城市政府乃至国家财政倾注力量予以运作。对此，著名的城市规划学者唐子来教授曾以“FACE”一词中的 4 个英文字母来形象地表述城市重大活动推进城市营销的 4 个方面。其含义大致如下：“F”代表了 Festival，即各种传统节日；“A”是 Activity，指各种主题活动；“C”是指 Celebration，即包括各种颁奖庆典；“E”是 Exhibition，是指各种展览展示。以上 4 个英文字母所形成的单词“FACE”正好又是“脸面”的意思，寓意了城市的一张“名片”。上述对“城市重大活动”这一关键词所作的创意性诠释，正是反映了当今以资本、技术和传媒等要素的全球化过程为特征的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转变。

之所以城市规划对“城市重大活动”予以关注，其中

较为直接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它们对城市空间环境和功能结构的改变带来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城市重大活动需要占用相当规模的城市用地，少则数公顷，多则也许几个平方公里。因此，重大活动其规划建设选址，可作为地方政府推进旧城改造、城市功能结构调整、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等实施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契机。尤其是在举办活动之后，场地、场馆的后续利用才是真正实现城市功能转型和空间优化的目的所在，从而实现城市长远的规划发展意图。例如，上海 2010 年世博会 5.28km<sup>2</sup> 场地的选址和永久性场馆的建设，推进了黄浦江在上海市区上游地段两侧的改造，特别是对于原来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用黄浦江岸线的现状，通过举办世博会，将一些工业生产岸线转变为城市生活岸线，加快了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和转型；同时，永久性场馆区将进一步规划建设成为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文化活动中心。这一城市级别的文化中心与以南京东路、外滩和浦东陆家嘴地区所形成的城市中央商务区遥相辉映，从而形成上海中心城区多中心、多极发展的结构。由此来看，上海世博会这一城市重大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上海大都市现代城市功能的重构，引领产业发展方式转型，推进了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这应该是较为睿智的“得”。

城市规划对“城市重大活动”予以关注，其中更为深层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它们对城市社会空间的改变带来深远影响。在这里，我们把“城市社会空间”定义为：城市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集体行为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城市重大活动通过对物质空间环境的改造，影响并重塑了新的城市空间环境，改变了不同社会阶层人群在空间上的集体行为，从而重塑了新的城市社会空间。这一社会空间重塑的过程，正符合 20 世纪法国哲学思想大师 Henri Lefebvre（亨利·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的要义。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是一个社会生产的过程，它不仅是

作者：杨贵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城市规划系副主任

一个产品，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他的论述揭示了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即城市空间的使用对象、服务人群。由于在一个特定的城市内部，城市空间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特定类型的城市空间由于其具有其相应的使用者或服务人群而具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因此，城市空间使用权利的公平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公平的本质。城市重大活动通过特定类型的空间再生产，重塑了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类型和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规划建设活动无法回避对于社会公平的考量。从空间公平到社会公平，这应该是城市规划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之一吧。

一项成功的“城市重大活动”，在规划建设方面应该体现出城市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优化的有机结合。在举办城市重大活动的名义下，城市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不以牺牲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为代价，反之，应通过利用改善物质空间环境的契机，来优化城市社会空间。例如，2012年伦敦举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选址于伦敦城市东部、泰晤士河下游北部的地区。此地区涉及的250英亩（约101公顷）是针对原有传统工业用地进行改造，并对周边贫困社区进行环境整治。在场地规划中，几处大型足球场地在赛后将作为生态居住社区中供居民种植水果和蔬菜的花园；可拆卸的比赛场馆和看台，便于在赛后将用地转型成为举办综合运动会的社区体育场，也可用来举办其他大型社区活动。伦敦市政府积极利用奥运会重大活动的契机，推动了伦敦城市东部旧区改造，通过对贫困脏乱地区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使得当地居民受到实惠，并且改变了伦敦人对于这一地区的原有的较为负面的认识，增强了这一地区的居住融合度，从而使得其城市社会空间品质得以提升。奥运会之后，该地区将成为大伦敦市城市空间东拓的有机组成部分，沿着泰晤士河的城市景观带也将得以东延，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将得以形成。这是城市重大活动推进城市物质空间改造和城市社会空间重塑的较好的范例之一。

然而，在不少情况下，城市重大活动成为“肢解”城市社会空间并使之隔离的助推器，从而造成了对城市空间使用的特权，远离了社会公平。例如，某些城市重大活动由于片面考虑美化城市物质空间环境，在重大活动所赋予的城市市政工程规划建设的名义下，对成片旧城居住区进行改造。改造之后的用途基本上是高档消费的场所，使用对象或服务人群是高收入的社会阶层，而原住民基本上被

高额消费门槛所阻隔。这种城市空间分异和隔离的过程，早在20世纪早期芝加哥学派的帕克、伯吉斯等人，就以“社会生态学”的方法予以了研究，即城市社会空间通过“隔离、侵入和接替”等过程，完成了社会富裕阶层对高品质城市空间资源的占用，即所谓的“绅士化过程”（Gentrification），从而形成了更多体现在居住形态和居住行为上的城市社会空间隔离。因此，一些城市重大活动的结果，尽管主观意愿很好，但客观上却导致了对低收入阶层的空间隔离、排斥，甚至是驱赶。在现代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重塑过程中，城市重大活动通过对城市空间环境的规划建设，由于片面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城市空间的新秩序被土地价格等因素“磁化”排列，而忽视了诸如历史街区的历史文化价值，忽视了日积月累的社会网络等方面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从而失去了城市社会空间再生产的社会公平之核心内涵。这应该是较为遗憾的“失”。

在快速城镇化阶段，城市重大活动作为城市社会空间再生产的主要动因之一，确实面临着重大考验。由于重大活动从决策到实施建设，往往时间短、规模大、任务繁重，而且有的时候建设资金也十分有限，要综合考虑错综复杂的因素，可能顾此失彼。然而，正是因为城市重大活动可能给城市带来的长远的后续效应，所以，有关城市重大活动的规划建设决策就更应该予以重视。从重大活动的规划选址，到实施活动阶段的安排，特别是对后续利用的综合考虑和潜伏设计，都应该谨慎而睿智。建议在进行城市物质空间环境改造的同时，充分重视原有城市社会生活肌理的多样化，重视原有城市日常生活的社会网络和活力，从而使得城市社会空间再生产的结果，既满足新的社会空间生产的需要，又反映出物质空间表象之后的社会公平。只有这样，才更能体现出城市空间规划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要义。

#### 参考文献

- [1] 唐子来, 陈琳.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城市营销策略: 观察与思考[J]. 城市规划学刊, 2006(6).
- [2] 杨贵庆, 黄璞. 大城市旧住区更新居民住房安置多元化模式与社会融合的实践评析——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11(1).
- [3] 孙萌. 后工业时代城市空间的生产: 西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方法解读中国城市艺术区发展和规划[J]. 国际城市规划, 2009(6).